

远古的匈奴



盖山林
盖志浩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元去的匈奴

盖山林 盖志浩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匈奴/盖山林 盖志浩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204-09310-6

I. 远… II. ①盖…②盖… III. 匈奴-民族历史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4018号

远去的匈奴

盖山林 盖志浩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3.5 字数:230千

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978-7-204-09310-6/K·526 定价:25.00元

电话:(0471)4971659(总编室) 4972052(发行部)

邮编:010010 电子邮件:dzbjs@163.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和《山海经·海内南经》。两书虽皆先秦晚期著作，但前者记载殷周间史事，多为抚古、传闻与想象，未足为凭；后者记载早期地理，亦多怪诞不经。《战国策》与《史记》所记则至少大部可信。其中时代明确可考的有以下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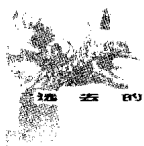
《史记·秦本纪》记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但有的学者据《史记·犀首传》所记“其后五国伐秦，义渠君乃起兵袭秦”，认为“义渠”实为“匈奴”；梁玉绳据《史记》“世家”与“年表”等记载，认为“攻秦者实燕、楚、赵、魏、韩、齐六国而匈奴不与也”。

《说苑·君游》记燕昭王与郭隗语，有“地狭人寡，齐人削蓟八城，匈奴趋驰楼烦之下”。

《史记·李牧传》记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256年）“居代、雁门，备匈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褕，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战国策·燕策三》记太傅鞠武谏太子丹：“愿太子急遣樊将军





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匈奴，然后可图也。”

对于以上记载，过去有人论证皆有疑问，好像战国晚期匈奴与中原交往似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文献记载的不确定性，故本书以考古资料为主，而辅以文献记载。比如，战国晚期赵国“匈奴相邦”印之出土，证实了先秦匈奴与赵确有关系。

摆在你面前的这本《远去的匈奴》，是匈奴历史的缩影，它涉及匈奴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也牵涉匈奴的来踪和去迹。它既能给史学工作者以框架，从宏观上了解匈奴的历史，也能使一般读者了解匈奴历史的一般情况。



盖山林

2007年10月20日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匈奴从何而来，属何种族	(1)
族源和族属	(1)
浑邪部与休屠部	(4)
诸王驻牧地	(4)
帝国的建立	(5)
匈奴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7)
氏族组织	(7)
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8)
社会制度	(11)
官制和出土的官印	(13)
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	(19)
狩猎业	(19)
畜牧业	(20)
农业	(21)
手工业	(23)
商业	(26)
交通	(27)
散落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遗址	(28)
单于庭	(28)



城 址	(30)
村落遗址	(38)
匈奴人的信仰	(39)
司马迁、班固、范晔笔下的匈奴祭祀	(39)
规模宏大的祭址	(40)
竿首与祭祀仪式	(45)
匈奴墓葬	(47)
墓葬举例	(47)
北匈奴墓葬	(65)
南匈奴墓葬	(74)
匈奴墓葬的类型和随葬品	(94)
匈奴手工业	(98)
车 辆	(98)
穹庐毡帐	(99)
兵器和工具	(100)
生活用具	(110)
衣 物	(111)
匈奴原始宗教与巫医	(113)
祖先、鬼神和天体崇拜	(113)
巫 医	(115)
匈奴的文化艺术	(116)
语言和文字	(116)
风俗习惯	(118)
民歌和音乐	(120)
岩 画	(121)
青铜器和金器	(136)
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	(157)
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161)
先秦时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161)
刘邦在白登山被围事件	(164)



汉武帝时汉匈交战与外长城的修建·····	(165)
汉王朝对匈奴归附人员的安置·····	(168)
汉匈和亲、昭君出塞·····	(169)
从王莽到东汉的汉匈关系·····	(175)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匈奴人物——金日磾·····	(175)
南北匈奴留下的历史故事·····	(177)
从五单于争位到南北匈奴的分裂·····	(177)
北匈奴的西迁足迹和欧洲之战·····	(179)
南匈奴附汉后留下的足迹·····	(184)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荡起的历史浪花·····	(186)
南匈奴与屠各建立的汉——前赵政权·····	(186)
卢水胡及其所建的北凉·····	(187)
铁弗匈奴的都城统万城·····	(187)
匈奴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190)
附 录·····	(193)
匈奴考古大事记·····	(193)
匈奴单于世系表·····	(199)
金日磾家系表·····	(203)
铁弗匈奴（刘虎）世系表·····	(205)
铁弗匈奴（赫连勃勃）世系表·····	(206)
匈奴独孤部刘库仁世系表·····	(207)



匈奴从何而来，属何种族

族源和族属

匈奴的族源、族属、原驻地及其变迁诸问题，一直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时至今日一直未达成统一看法。关于匈奴的族源和族属，归纳起来有以下九种观点：

传统说。认为匈奴由先秦的鬼方、猷夷、昆夷、荤粥、獫狁、山戎和北狄中的赤狄、白狄等演变而来。这一观点，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坚持这一观点者，有何震亚和吕思勉等人。

西方族源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匈奴并非东方土著，乃西来民族。岑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一文中说：“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后，其国有九姓胡不少），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可见西方族源说，实即匈奴突厥说。

北方草原民族说。是俄罗斯和蒙古的一些学者提出的，认为匈奴族与蒙古境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所谓石板墓文化代表者有关。后来国内



学者也有持此观点者，比如，杨建新先生认为：匈奴族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融合了从夏、商以来活动于北方的鬼方、荤粥、獫狁、狄、戎等各种部落，甚至还包括由中原北上的一部分华夏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从他的族源方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北方的许多部落，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是战国后期才形成的。^①

义渠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蒙文通和黄文弼等先生。黄文弼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认为：鬼方、荤粥、昆夷、獫狁皆古人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可见黄文弼先生不仅认为匈奴族源有义渠，而且包括林胡和楼烦。蒙文通先生亦力主匈奴义渠之说，他在《犬戎东侵考》等多篇论著提出，先秦的鬼方、猷夷、荤粥、獫狁等并非匈奴的族源，匈奴应与义渠为族属上的同类。

夏族说。《史记·匈奴列传》谓：“其先族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括地谱》谓：“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又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这里直率地说，夏桀之子率众北徙。奔北的夏族，后来与匈奴融合，成为匈奴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与夏人一同北迁的还有昆吾。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吴）氏、禹氏，楚则曰昆吾、昆仑。《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徐中舒说：“他们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左传》语：“昆吾夏桀同日亡。”《诗·商颂》也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夏人与昆吾关系极密，他们似是同宗伯国，因此两者同时都向北移徙，并协同作战，后来又都与匈奴融合。《说文》谓：“壶，昆吾鬯形器也。”夏代之后，鬯形器屡屡在山西、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出土，正是昆吾原住北地并由此北徙在考古发现上露出的蛛丝马迹。

匈奴的族源构成，在卜辞中也露出了一线光明，见于卜辞的舌方、土方、鬼方、羌方等，许多时候他们是商的敌国。到后来，也成为匈奴的族源之一。《诗·商颂》谓：“禹敷下土方。”土方的地望安在？邹衡以为在山西石楼县，李伯谦说“当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两说甚近。胡厚宣还考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住的地方。武丁之后，土方、舌方被打败，逐渐融入匈奴。

^① 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



关于匈奴人的族属，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大约可分为蒙古族、突厥族、芬族或斯拉夫族四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匈奴的族源、族属问题，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经过近二百年的讨论，在目前西方学界，认为匈奴属于芬族或斯拉夫族者已很少见，唯主张匈奴是突厥族者仍占多数，主张蒙古族说者，多为日本和蒙古学者。

当今的学者们，也注意从人种学上寻觅匈奴起源的线索。对蒙古和外贝加尔墓葬所做的人骨测定，均显示出匈奴人的蒙古人种属性，但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匈奴族包含了多种民族成分，为解决此问题，必先弄清哪些人是匈奴民族的主体，哪些人是匈奴别部。

匈奴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中国学者的传统观念，大都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为匈奴文化的前身，鄂尔多斯高原及其之北阴山地带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青铜动物纹饰牌和阴山匈奴岩画，以及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青铜马具等游牧人文化遗存，支持了这一观点。然而一些学者，特别是蒙古、苏联学者，多认为匈奴文化起源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方形石板墓文化，认为石板墓文化居民是匈奴早期国家的重要成员。蒙古学者道尔吉苏荣认为匈奴民族的起源与石板墓文化居民有亲缘关系。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匈奴人种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部落甚至不同人种的联合体，这也是匈奴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经常性地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中国学者也有人同意这个观点，比如乌恩也认为南北匈奴的起源不同，北匈奴起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而南匈奴的发祥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更有的学者提出，石板墓文化不是当地的匈奴文化的基础，匈奴与中国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关系密切，他们在公元前2世纪游牧到漠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学者似乎将寻找匈奴起源的目光更多地投在公元前8~前4世纪的鄂尔多斯东北地区。

总而言之，当今国内外学者对匈奴起源地、族源、族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和贝加尔地区石板墓分布地与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周围两个地区。到底匈奴文化源于何地？又何以由南而北或由北而南发展？至今人言各殊，尚没有统一的说法。





浑邪部与休屠部

浑邪部和休屠部虽均归属于匈奴，却并非匈奴本族，而是匈奴中较为特殊的部落。

浑邪部非匈奴本族，就族源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其基本成员应为义渠人^①。浑邪也称昆邪。西汉前期的浑邪虽归属于匈奴，但就族源而言，应与战国时的义渠有着直接关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附“公孙贺”载：“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匈奴中有浑邪部，汉代义渠人中亦有以“浑邪”为名或以“义渠”为姓者。看来汉代的义渠人与匈奴浑邪人在族源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休屠也是匈奴中一较为特殊的部落。休屠部是否为匈奴本部，自东汉以来就开始混乱。

浑邪部与休屠部虽非匈奴本族，但最后均融于匈奴，成为匈奴的组成部分，故将此两个部族视作匈奴亦无大谬。

诸王驻牧地

匈奴单于庭及左右贤王所管辖的地域都有一定界限，左右贤王之下的诸王也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这是匈奴结合驻牧的草原而特定的统辖管理办法。《史记·匈奴列传》赫然写道：“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等，凡二十四长；诸左方王将居东方，对着上谷以东，右方王将居西方，对着上郡以西，单于之庭则对着代、云中郡；他们各有分地。”

匈奴诸王驻牧地，即其管辖地，中外学者多有考订，但多为推测之辞，因为一无史书记载，二无考古物证，故难以遽定其具体地点。但也有

^① 武沐：《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

一部分匈奴王的“分地”即驻地，根据史书记载，还是可以大体推定的。约有十多个匈奴王的驻地可大体推知如下：

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犁汗王及温偶涂王的驻牧地，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北一带；姑夕王的驻牧地，在匈奴东边（约在今内蒙古通辽、赤峰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一带）；左犁汗王咸的驻牧地，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一带；日逐王的驻牧地在匈奴西边，与今新疆连界；东蒲类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南犁汗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及准噶尔盆地以东一带；於鞮王的驻牧地在今贝加尔湖一带；右奥鞮日逐王比的驻牧地，在今内蒙古旧长城以北，西自河套、东至河北北部南洋河以西一带；左伊秩訾王的驻牧地，在今锡林郭勒盟一带；皋林温禺犊王的驻牧地，在今蒙古境内满达勒戈壁附近；句林王的驻牧地，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北约三百余公里处；呼衍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伊蠡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腾格里山一带，距离车师前庭（今吐鲁番雅尔和屯）不远。

帝国的建立

起初，匈奴的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长的职位是选举而来的，权力是由氏族或部落会议授予的，他们的地位与氏族成员是平等的。其后，由于匈奴长期的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并由此加快了匈奴氏族公社的解体和私有财产、奴隶的出现，匈奴的氏族贵族及其世袭权力也出现了。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领逐渐专擅了权力，世袭了职位。

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抬头，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由原来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而逐渐地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

这种逐渐膨胀起来的世袭制，由小而大，至公元前209年，便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匈奴冒顿单于为了世袭单于之位，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由是时起，单于由选举产生之制，而变





作一家之世袭。此后，匈奴最高权力由挛鞮氏一个显贵氏族所继承，以父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流传下去。其他的高官贵职，诸如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卢等，也概由一些显贵氏族或家族世袭。《史记·匈奴列传》说，“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悉为贵种，各大臣都世居官。”这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说得更详细清楚：大臣中的显贵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犊王、左右渐将王，皆由单于子弟充当，依次第将来可能充当单于的接班人。单于姓挛鞮氏，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这四姓都是匈奴中的名门望族。



由于世袭权力的建立，特别是单于世袭制的确立，部落或部落联盟机构形式，尽管其躯壳外形仍旧保留，然而它的民主原则已被抛弃，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机构的作用已烟消云散了。这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得再清楚不过了。自冒顿自立为单于之后，匈奴的军政大事，表面上虽也征询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但往往不予采纳，在行动上独断专行，甚至将与己意见相左的人斩首示众。单于往往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命令各个部落首领按时出征，“有后（至）者斩！”匈奴从冒顿单于开始，个个单于俨然是神气十足的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原来那种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形象已荡然无存了。

单于对匈奴周围的邻族，也大加征伐，以扩张领土，夺取粮食财物。冒顿单于在位期间，大力强化武力，先后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后又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乌桓及其旁各族。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匈奴帝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奴隶、贡品源源流入，私人财富骤增。为了保护巨额财富，镇压奴隶和被征服者的反抗，在蒙古高原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国家。

匈奴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匈奴人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匈奴人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氏族组织

匈奴尽管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然而当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仍是不稳定的，时合时分。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描述的那样：“自淳维（传说中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是汉代司马迁对匈奴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不稳定性的生动表述。在氏族组织中，匈奴人过着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没有阶级和压迫剥削的原始公社的生活。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公推出来的，匈奴的第一任单于头曼，便是由部落联盟公推的首领。然而这种生活，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却发生了大的变化。匈奴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制。





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匈奴约从公元前3世纪前后，逐渐进入铁器时代。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匈奴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出现了社会产品的剩余，从而促使了匈奴游牧经济从集体化转变为个体化，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成为可能。

畜群的游牧，尤其是缺乏饲料的冬季游牧，小畜群较之大畜群容易得多。为保护、繁殖牲畜，需要将大畜群分做小畜群放牧，这样便逐渐由氏族公社的集体游牧转变为个体家庭的分散游牧。

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形成，匈奴的氏族公社出现了三个特征：

牧场和游牧地的公有制与牲畜的私有制相结合。匈奴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牲畜的个体家庭，从漠北已发掘的属于公元前3~前2世纪的匈奴墓葬看，有些墓大而豪华，有些墓则小而随葬品贫乏，看来贫富分化极大。这时的牧场和游牧地仍属氏族公社所有，而牲畜已属于个体家庭所有。

氏族公社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分地”即“份地”，即牧场和游牧地是公有的，各家只是靠份地放牧使用而已。利用这种所有制，以保卫本氏族的安全，使其畜群和牧地不遭外族部落的侵扰和袭击。在私有制形成过程中，“匈奴明以战攻为事”，掠夺性的战争成为匈奴首领的经常职业。因此；匈奴人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要按着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出征、投入战斗。这时的匈奴氏族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平时赶着畜群、射猎禽兽进行生产，战时则人人为兵、投入战斗，“这样的组织，（甚至）是公社所有者存在的条件之一。”

氏族公社的实质已不再是建筑于血缘基础上的亲族单位，而是建筑于地域基础上的军事行政单位。氏族组织，原先本是一种血缘组织，后来由于阶级的形成及频繁战争所造成的氏族成分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使固有的氏族血缘关系难以为继，在氏族组织中，除原有本族成员外，加入了东胡人、汉族人、月氏人、白羊人、楼烦人、丁零人、鬲昆人、羌人、乌孙

